

编委会

执行主任 华文贵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平 王星航 王建学 田久川
关捷 刘恩格 孙激扬 洪文成
董志正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珍仁 尹淑杰 华文贵 周爱民
褚庆玉 谭晓玲 潘茂忠

主编 华文贵

副主编 王珍仁

编务 周爱民 由林鹏

· 卷首语 ·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大连近代历史研究

华文贵

《大连近代史研究》经过史学界众人的关注和精心培育，在经过一段试刊后，现得以公开刊印发行。《大连近代史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时期大连地区的历史，同时也涉及东三省的抗日战争的历史以及全国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列强对大连地区的滋扰与渗透研究；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研究；日俄殖民统治史研究；旅顺日俄监狱史研究；中日近代历史人物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以及方志历史文化研究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科研水平，我们需要不断地改进研究的方法，寻求科学的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并用它来指导大连近代史研究的各项工作。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指导我们去抓住机遇，推动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大连近代史研究来说，必须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在已有的发展基础上，顺应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客观需求，从大连近代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好科学研究的发展战略，科学地解决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矛盾和问

题。大连有着百年的沧桑岁月,这百年来民族存亡的历史,不容我们遗忘,我们必须始终围绕维护民族解放与独立来做文章,进一步深入研究大连近代史的相关课题,不断地发掘新史料和探索新理论,树立起科学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

认真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的方法论和辩证的唯物史观指导大连近代历史的研究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法则。大连近代史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连近代历史,而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正确反映客观史实,从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我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正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用科学发展观来观察、分析大连近代的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探寻历史规律。同时,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有意识地从大连近代历史研究中寻找相关的题目,用历史经验来阐释科学发展观,不仅有助于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宣传,也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发挥学科优势的好机会。

对于推进大连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问题,我们应当自觉地运用科学发展观来加以审视,以便进一步认清大连近代史研究的任务、特点和工作内容及方法,做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史研究的总体工作,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大连近代史研究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之中。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第一,要牢牢把握大连近代史研究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写史,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代言。第二,正确处理史学理论研究 with 史料发掘工作的关系,切实推进大连近代史研究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第三,正确处理科研工作中研究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切实做到在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工作中理论和实践的协调发展。第四,正确处理科研与人才的关系,尊重和爱护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到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以人为本,切实做到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必须寻找突破口,坚持创新发展。首先,要使史学研究工作得到创新发展,就要与中

外史学界的发展变化的形势相适应,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如果我们不加强这种横向的业务之间的联系,就跳不出狭隘的研究范围,而只能是一味地追求孤立发展,组合不成新的创新点,完全依赖于自身发展的盲目自信,而不去积极地吸收他人的经验成果,对外没有任何影响力,其结果只能是默默无闻,创新发展等于一句空话。其次,在实现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思想观念上的突破是创新发展的根本性突破,没有创新的思想就不可能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中,一定要坚持以创新发展为主,适度拓展外延的发展战略。对于大连近代史的研究,同样存在着许多的创新思维:一是抗日战争理论研究,对于抗日战争研究并不是大连近代史研究承担的主要课题,但是如果大连近代史研究离开了抗日战争史所涉猎的范畴,那么大连近代史研究就会缺乏宏观上的指导。二是对一些常见的研究课题,必须针对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新的研究内涵,如:甲午、日俄战争研究,现今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可以说是进入到鼎盛时期,无论是从著书立说,还是从学术论坛,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甲午战争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的空白,现在研究的范围只是限于战略、战术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人物的研究不够全面,只是停留在几个著名将领的范围内。另外,在日俄战争研究上,由我所资深研究员主编的《日俄战争史料》、《日俄战争始末》和《日俄战争史略》虽得以公开出版,充实了对日俄战争的史料研究的不足,但目前关于日俄战争的专题研究仍显得十分薄弱,而且不系统。日俄海战、陆战,双方战略战术,双方焦点人物等均没有具体而且有深度地展开研究。此外,日俄战争对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略战术带来了哪些可借鉴的因素,仍然无人去深入研究和探讨。三是对于俄国占领旅顺、大连的七年殖民史研究,目前,除了董志正的《旅大史话》、田久川的《沙俄侵占旅大的七年》、王洪恩的《日俄侵占旅大简史》等专著外,少量文章散见于大学学报,但其深度尚难令人满意。四是日本殖民旅大四十年史研究,由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和大

连市政协编辑的帝国主义侵略大连史丛书《大连近百年史》、《大连近百年风云图录》、《大连近百年史人物》、《大连近百年史文献》和《大连近百年史见闻》，对日本殖民旅大四十年史进行全面的记述，但对于专题研究却很少，如殖民时期的社会史、民俗史、文化史、工商史等等，很少有所著述。五是满铁史研究，关于满铁的资料现在已经问世很多，但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六是关于旅顺日俄监狱史研究，由于监狱档案被毁，研究工作十分困难，现在所搜集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七是对于中日近代历史人物研究，没有任何突破点，没有新史料的发掘。八是对于方志历史文化研究，相关的论著少，从事此课题的专家也寥寥无几。这就需要史学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并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大连的近代历史研究工作，制定适合大连近代史研究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学科建设规划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注重史实，学会考证，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作为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要以史料为基础，探寻新的理论成果，而新的理论要构建在大量充实的史料积累之上的。因此，大连近代史研究就要做到统筹兼顾，要加大力度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进一步加强史料搜集的广泛性。同时，对于占有的资料，必须严格审查。“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求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①，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揭示历史规律，就不能轻视史料和考证史料的重要性。研究大连近代史，引出理论性的结论，绝不是靠讲空话。要认真搜集整理资料，要考证重要史实，在研究大连近代史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要充分地掌握历史事件的各个方面及主要过程。如果大连近代史研究离开了详细占有史料，离开了做好史料考证工作，离开了进行科学分析，那么揭示大连近代

^①《资本论》，卷一，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史研究的历史规律和引出理论性的结论，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已。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研究的社会效应。“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任何学科发展的源动力，就是服务于社会，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历史研究的作用，更注重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以史鉴今的社会功效。列宁在讲到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时说，“我们必须努力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②。大连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对于人物、事件等相关内容的研究结论，宣传爱国主义、传播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发展规律、揭示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与发展规律，用历史经验、历史知识丰富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对史学研究而言，以人为本具体地体现为以业务人员为本，不但要以业务人员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更重要的是以促进业务人员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业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大连近代史研究来说，我们尤其要注意团结和使用好人才，允许“和而不同”，讲求“和衷共济”，打破部门和单位的界限，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把人才资源开发作为推动大连近代史研究的第一力量。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人才工作，做到以任务带科研、以基地建团队、以发展引人才，引进、培养、流动三者要统筹考虑、协调推进。对于青年人才，我们鼓励他们去深造、再学习，以各种有利的政策，让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2页、第283页。

②《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他们读研,提高他们受教育的层次,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

当前,大连近代史研究处在十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对此我们更要有深刻的认识,才能使大连近代史研究工作发挥出广泛的社会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和重视以下几点: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大连近代史研究工作,做到尊重史实,以史为据。二、以科学发展观剖析大连近代史,达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目的。三、建立科学的理论研究体系,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大连近代史研究工作。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是实现大连近代史研究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从提高大连近代历史研究水平的高度出发,在有序地推进大连近代史研究的各项发展工作的进程中,自觉坚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想问题、作研究、作学术的全过程,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科学态度抓好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为大连近代历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华文贵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大连市社科院
特邀研究员 大连 116041]

目 录

· 卷 首 语 ·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大连近代历史研究 华文贵(1)

· 中日关系史研究 ·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对策探索 关 捷(2)

浅论日本文化的特点 于宁宁(16)

近年日本否认侵略历史之探析 刘力维(25)

评抗日战争时期的尾崎秀实 关 伟(38)

东北义勇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历程及历史功绩 穆景元(49)

东北官民为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所进行的斗争 张欣悦(63)

论马占山指挥下的江桥抗战 刘淑梅 张春波(70)

· 甲午、日俄战争研究 ·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经济原因 于春梅(82)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外扩思潮 吴丽华(91)

论甲午爱国思潮 邢丽雅 苏 醒(102)

甲午战后的洋务思潮	高学军(115)
论甲午盖平之战	杨惠萍 单保国(128)
甲午战争中的魏光燾与牛庄防御战	靳 实 周晓红 程英梅(143)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朝野反割台的努力	于耀洲(166)
论方伯谦被杀	关国磊(185)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旅大地区的统治与扩张	周 彦(191)
日俄战争为日本“领有满蒙”铺平了道路	关庆凡 刘恩格(201)

·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史研究 ·

大连地下党组织屡次遭破坏的原因教训	陈光真(216)
东北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唐韵超	刘 影(227)
热血镌刻下的忠诚——杜继曾	徐 杰(244)
丹心碧血照千秋——姬守先	刘志民(254)
1924—1933年大连共青团组织发展概况述论	由林鹏(260)

· 旅顺日俄监狱史研究 ·

旅顺监狱墓地遗址探究	周祥令(276)
旅顺刑务所作业的兴起与发展	周爱民(283)

·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四十年史研究 ·

奴化教育派生的毒瘤

——大连地区伪满人物综述	王万涛(300)
战时体制下“关东州国家总动员令”的颁布	冷绣锦(306)

日本统治时期大连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发展

.....岛 语 李东风(322)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的“战时体制教育” 崔再尚(327)

· 满铁、关东军史研究 ·

满铁,日本侵华扩张的桥头堡 王珍仁(338)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攫取我国东北铁路路权始末 郭铁桩(357)

关东军历任司令官评介 王江鹏 编译(370)

· 历史方志文化研究 ·

胆识兼备的爱国官吏刘含芳与鸿胪井刻石 董志正(394)

论旅顺是大连最早的近代城市 刘功成(400)

甲午战前旅顺口建设述略 刘俊勇(410)

近代以来大连的人口特征与城市化 徐晓飞(418)

编后记《大连近代史研究》编辑部(425)

大连近代史研究

第3卷

中日关系史研究

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对策探索

关 捷

摘 要: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现象,“政冷”原因主要是历史认识、台湾和战略取向的摩擦等问题,尤其是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审定篡改历史的教科书等,更激化了两国的矛盾,造成两国领导人停止互访,两国民众相互厌恶情绪增强。中国为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政策,在新时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加强联系,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实现世代友好,采取了许多措施,本文提出了五项对策。

关键词:中日关系 中日友好 政冷经热 对策

—

近年来,中日关系发生了变化,两国关系逐渐疏远,而不是日益亲密。当前两国关系现状的主要特点是“政冷经热”。“政冷”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两国首脑互访中断4年之久,其他领导人直面对接触少,互访少,合作少,签约少;二是由于历史认识和现实问题,两国民众相互厌恶情绪在增强。诸如“齐齐哈尔毒气”、“珠海卖春”、“西安大学生反日游行”、“亚洲足球赛球迷起哄”、“沈阳总领事馆”和“日人修汉奴(王直)墓”等一系列事件,反映了两国民众的情绪。

最近,围绕海洋资源调查、钓鱼岛归属问题、李登辉访日、《美日联合声明》涉及台海和海上石油开发等问题,激起我国民众的愤慨情绪,对日本的亲近感下降。日本国民对中国坚持友好的仅占37%,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热”已向冰点逼近。

与“政冷”相反,中日两国的“经热”不容否认。表现在中

日两国间经济贸易突飞猛进,贸易额逐年增长30%以上;2003年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335亿美元,2004年两国贸易额突破1600多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表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企业进入中国日益增多,受益巨大。近年“中国特需”的拉动使日本不景气的钢铁、造船、建材热起来,仅造船一项,三年的订单已满,其中多为中国所订。同时中国的西气东输,大大连的建设、大西北的开发、东北老工业区的改造,对日本经济发展都是极好的机遇。如此以来,“中国威胁论”减弱了,“中国机遇论”得到认可。可以说经济贸易已达到双赢。这就形成了两国经济的互补型发展,进出口基本趋于平衡。

两国民间往来虽受“政冷”些微影响,其交流(包括地方交流)仍然在进行,且异常活跃与务实。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日两国友好城市,截至2004年9月,已达226对,现在仍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务实。如上海与大阪间互设办事处,可以处理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互为咨询,调解纠纷等,对推动两地民间交流产生了良好作用;第二,友好团体交流仍在进行。中日民间学术团体按计划进行活动。中日关系史学会在北京邀请日本驻华大使和学者做学术报告,介绍日本国情和学术状况,经过多年筹备,搜集资料编成并于2002年出版《友谊铸春秋——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卷一),受到两国学者和民间人士的欢迎。日本有的团体坚持介绍中国文化,教育青少年一代了解过去的历史。如小学教师松冈环女士,自1985年起,每年“八一五”都率领“铭心会”成员到南京悼念日本侵华时被杀害的中国人,并经常邀请专家研讨中日问题,代表了日本人中正直、有良知的纯洁本性;第三,两国往来人员没有减少,日本在中国常住人口达10万人,仅上海就达3万人。2003年两国交流人员达368万人次(每天1万人次之多),尤以记者、留学生占多数;第四,两国交通日益便利,仅航班的增加就表现出两国往来依然很密切。如大阪至我国的航班达15条,北京、上海往大阪航班也很多。

二

中日两国“政冷”的原因，主要有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战略取向的摩擦等。

历史认识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是当前最敏感的问题，它将中日关系引入僵局。另一表现是日本不正视历史，编写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如东京白鸥中学采用的《新历史教科书》，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颠倒黑白或随意抹煞。书中将 110 年前的甲午战争写成“日清两军冲突”而引发的战争；将 100 年前的日俄战争描绘成“为了维护日本独立和主权的卫国战争”；二次大战期间对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与蹂躏，说成是“将这些国家和人民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战争”；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由于所谓的“中国排日运动激烈”引起的；把“七七”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歪曲成“中国一侧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的结果；“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死人是“由于日军的攻占，导致多人死伤”；吞并朝鲜写成“朝鲜自愿并入日本”。当然也应看到日本右翼政策的实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历史教科书》一出笼，就遭到日本 76 个民间团体的抗议，抗议书上 2.9 万人署名，而且还引起网络联盟抗议。前首相三木武夫的夫人三木睦子还专门召集历届高中毕业生起而抗议、发传单、签名。日本第二大报《朝日新闻》2004 年 8 月 27 日评论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样的教科书不能培养出与世界各国交流、珍惜历史和传统的年轻一代。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 21 世纪事务局局长代表各团体发表声明，抗议新教科书不反省侵略。和平之舟代表则认为篡改历史、美化战争的日本显然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许多民间团体还走上街头广播、散发传单，呼吁日本民众阻止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进入课堂。

尊重历史，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作出真诚的道歉，是日本政府取得亚洲人民谅解，树立起日本形象的根本点。人所共

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恶极大，但是由于德国政府对过去的不光彩历史真诚认错，赔偿受害者损失，得到世人谅解，重塑了德国人的形象。德国能做到的，日本也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是由于“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相勾结，相互利用。民进党竭力迎合日本，对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损害，采取漠视与原谅的态度，以获取日本对台湾的支持；日本右翼分子则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美日联合声明》中，日美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则是联手软硬兼施干预台湾问题，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为中国和平统一制造麻烦。

至于中日两国的战略取向问题，主要反映在中日两国都处于历史转折期，各自在不断变化和调整，需要两国政府和国民的心态进行调适，这既是挑战，也是务实的必然。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有一部分日本人庸人自扰，担心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影响，首先是经济在亚洲的“独尊”地位受到挑战不甘心；其次是嫉妒与防范中国成为“霸主”。为此，日本媒体轮番炒作“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报复论”、“日本空洞论”，其后果就是致使日本广大民众对华亲近感下滑。

从上述可见，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交织，左右着脆弱的、走向低谷的中日关系，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大局。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首历史会发现中日两国间的“三个相互”（相互依存、相互竞争和相互对立）的基本框架并未根本改变。人们不能怀疑中日关系的主流是相互依存，然而相互对立始终存在，不能小视；相互竞争则是在相互依存与相互对立的夹缝中不断变化，这种竞争的结果可能因两国政府充分认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积极应对，通过和平竞争，会使中日关系有序的发展；如果竞争采取非理性、依靠别国操纵与控制，不平等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对立乃至敌对，最终使两国关系走向崩溃。

中日关系中问题实在不少，但是“政冷经热”是否会永远继续下去？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一种观点认为,中日两国伤了感情,难以弥补;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国虽伤了感情,但是并未伤筋动骨。因为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两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充分认识平等相待、相互依存的关系。用一句说了多少年的话,两国都应努力做到“求同存异”。

当然,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同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的既未发生大战,也未发生小战,可以无条件谈平等往来,而中日间则完全不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带给中国的灾难太深重了,因此,中日间建立互信,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日本政府实实在在地承认侵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了伤害,并保证以后不再制造事端。

在日本认罪问题上,有人说:日本认了罪,道歉问题已解决,不能总让人家见面就认罪吧!日本也有人说:日本已道歉23次了。其实这是一种模糊观念。有的日本首相个人曾表示日本的侵略给中国添了麻烦,甚至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类似言论一出,马上遭到日本右翼反华势力的猛烈攻击,甚至野蛮的威胁,虽然日本曾多次表示道歉、认罪,而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断失信,不仅通过教科书否认侵略罪行,其右翼政治家、右翼文人甚至把自己打扮成“理论家”、“爱国志士”,在胡说中国批评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是“干涉内政”、“不尽情理”,甚至出谋划策说:小泉应学习石原慎太郎,多去靖国神社参拜,在关键的日子去,让中国疲于抗议。在这些人看来,日本无罪可认。最近更冒出一种新说法,诬蔑中国政府进行“反日教育”,就连日本资深外交家、内阁辅佐官冈本行夫竟也在《读卖新闻》(2005年1月3日)上撰文声称:“在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下,年轻人的反日情绪高涨。”这是无知妄说。中国的教科书、纪念馆,都是忠于历史事实,以便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祖国所经过的苦难历程,从而激起奋发图强、建设好国家的豪情,使中国真正自立于民族之林。从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著作)、任何一个展览馆、任何一部影视剧,更没有任何一位国家

领导人公开号召中国人复仇、报复，相反，我们的文化和教育从来就是教育国人以德报怨，不计前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要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这是中国对日本的基本国策，是谁也歪曲不了的事实。

近来，还有一种日本是亚洲的骄傲的论调，这一命题过于宽泛，外延无限。人所公认，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较快，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予以肯定、赞扬，引以为骄傲，可以让人信服。但仅以经济为依据，称日本是亚洲的骄傲则并不全面。考核一个国家是否被公认为值得骄傲，还是看其政治是否不当别国的附庸，不称霸，独立自主，尊重别国。如其与邻国不能真正平等相处，不能丢掉“东亚霸主”幻想，而在政治、外交上又唯他国马首是瞻，其政策追随霸权国家，又怎能受到其他亚洲国家的称颂。同时，在经济发展上，也应与多国平等贸易，尽可能资助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想把别国当成原料供应地、产品市场。在文化上，应尊重别国的文化，不制造、输出伤害别国的文化、教育产品，诸如电影、文艺作品、教科书，也不宜宣扬误导本国青少年的伪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涉及中日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诸如对侵华不以文件形式认罪、道歉，参拜靖国神社视为理所当然，将中国的领土钓鱼岛称为日本领土之外，近来又有两件事挑衅中国：一是2005年1月31日，日本媒体披露日美拟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台湾问题明确列为“美日共同地区战略目标”，而且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守屋武昌公然向中国表明：这“只是确认过去以来既有的方针”。什么“既有的方针”？就是要将日美防卫合作领域扩大到“台海”，为有朝一日以“合法形式”插手台海局势做准备，表明统治台湾50年的日本，至今割舍不下“台湾情结”，仍对台湾怀有野心。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首次公开地将台湾称为“共同安全考虑”，台海议题也被纳入“共同战略目标”。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编造“中国威胁”的一系列“证据”，为“傍美”制造舆论。十分明显，日本之所以有恃